

广东省居民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效应

杜薇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在修正的 Mincer 工资方程的基础上, 利用中山大学“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 以广东省为例, 首先测度出代际传递的程度, 并在提出社会能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的假设下, 运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 对比代际传递与个人奋斗对收入的作用大小。研究发现, 代际传递对收入的效果的确是大于个人努力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个体虽然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提高收入, 但却相当艰难。相对来说, 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个体却轻松许多。

关键词: 收入差异, 代际传递, 个人奋斗

中图分类号: F063.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1978年以后, 市场经济改革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GDP 高速增长, 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 人们的收入差距却日益扩大。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 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 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收入不平等。阿瑟·奥肯(1975)曾说, 在我们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 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一直困扰着我们, 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权衡的。改革开放初期, 有的人拥有一定资源, 通过积极努力, 敢于冒险并大胆创新, 加上一定的天赋和运气, 从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实现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人们则可以通过他们拥有的资本赚钱, 并且越来越容易。更重要的, 他们的下一代还将会继承他们的财富。《福布斯》2010年发布的最年轻的亿万富豪排行榜中, 中国富豪与排在首位的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不同, 碧桂园的杨惠妍、山西海鑫的李兆会的财富均不来自白手起家, 他们生下来就坐拥过亿身家(南方都市报, 2010)。贫困与富裕者因为继承的财富不同, 成长的起点不同, 从而使收入差异传递给后代。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富裕家庭的孩子奢

侈的消费行为引来众人不满，被大家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农民工子弟们自嘲地自称为“农二代”，更有“穷二代”大声疾呼他们不愿意生育“穷三代”，因为“穷三代”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在线，注定要在贫困的边缘的苦苦挣扎。古有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今有官宦子弟肇事后狂妄叫嚣“我爸是李刚”，贫困或是富裕像是有了遗传特性，子女们很容易就继承上一代的境况，出现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贫困群体很可能将走向长期贫困。

毋庸置疑，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是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可避免的，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贫穷家庭出生的人有没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使收入得以提高。这就需要社会——主要是政府——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使贫穷的人拥有向上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打破平均主义思想，由为社会创造结果公平转变为机会公平，生活中靠白手起家的富豪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但是，很多学者依然认为，白手起家的富豪只是个例，中国依然处于机会不平等的状态。因此，研究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的程度是否大于机会改变的效果，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实现一定的公平。

二、代际收入差异传递及其测量

美国的经济学家最早对收入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研究。他们是在好奇为何贫困阶层会持续贫困时，发现了贫困家庭的贫困存在代际传承现象（李晓明，2006）。当某一代的收入在总人口中的位置受其上一代的收入在总人口中的位置影响时，说明存在收入的代际传递（方鸣，2010）。因此，收入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或富裕）的代际传递指贫困（或富裕）及导致贫困（或富裕）的成因在家庭内部由年长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使年轻一代继承父母的状况，并进而将贫困（或富裕）继续传递给其下一代的状态。而两个家庭的父代在总人口位置的差异影响子代在总人口中位置的差异就指的是收入差异的代际传递（胡永远，2011）。

收入差异又称收入差距，指的是我国居民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同。在其度量指标方面，学术界现在最常用的有 Gini 系数、Theil 系数、Atkinson 指数、方差与变异系数、人口等分组的收入分布图、库兹涅兹比率等（高鸿祯，1993）。收入差距的程度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ini 系数自 1978 年的 0.317 上升到 2004 年的 0.465，已经超过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而此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之后 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的 Gini 系数继续上升到了 0.47。Jha（1996）、Ram（1997）等研究表明，目前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等采用的 Gini 系数指标不能完全测算出收入差距，实际的收入差距程度可

能更大。赵人伟、李实（1997）考虑了寻租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用数据统计表明，城市人均工资中最高的3%收入组与最低的10%收入组的比率在1988年为7.69，而到1995年就上升到了11.82。

影响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学术界主要从个人特征、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市场特征三方面来研究。个人特征方面，1974年，Jacob Mincer第一次提出收入模型，研究了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对个人工资的效应。自Mincer工资方程提出以来，不同国家的学者分别针对本国国情改良了方程，分别加入了性别、职业差异、行业差异、所有制差异和城乡差异等控制变量（彭竞，2010）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的情况，诸建芳（1995）、Byron & Manaloto（1990）、Bian（1997）等分别在Mincer工资方程中加入了性别、教育和社会资本，得出了一些关于我国个人工资收入差距原因的实证结果。个人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方面，柏培文（2011）认为这主要表现为工人和企业了解工人的工作能力和比较优势等信息的能力，这种互动关系在工资决定机制中有一定作用。市场特征方面，Kuznets（1955）、Schultz（1998）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会呈现“倒U型”。但是，蔡昉（2000）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异的“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仍处于上升阶段。陆铭等（2007）、王小鲁等（2005）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差异、公共产品的供给差异等劳动力市场制度方面论述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

研究收入的代际传递的方式，即是研究父代的收入是如何传递到子代的过程。第一条路径是直接传递，父代的钱和资产可以通过遗产、赠与等方式传递给子代（Moore，2001）。第二是通过人力资本。1979年，Becker & Tomes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首次使用经济学的框架研究收入代际传递问题。在这个框架中，父母将决定如何在当前消费和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间抉择，从而达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最终父代会决定将自己的收入分配多少用于子代教育，从而影响子代的收入（Marcus & Harper，1997）。第三种渠道是通过文化资本，1959年，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贫困家庭进行案例研究时指出，贫困之所以会传递，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冷漠、屈从、不重视教育、早期性体验、对政府的不信任等价值观，从而使他们长大后难以融入社会，从而继承了上一代的贫困。（王兆萍，2004）最后一条路径是社会资本，Bowles（1972）证明了社会资本同样作用于收入的代际传递，其认为高收入的父辈拥有更多的“关系”，从而给予辈带来更多收入。

早期学者们用代际收入弹性度量收入的代际传递，代际收入弹性是指子代的收入受其父代收入的影响大小。1978年，Atkinson和Maynard运用相关系数的方法测算英格兰的代际收入弹性大小为0.17。后来，Atkinson（1980）对估算代际收入弹性的方法进行了总结：一是

对数线性模型，回归方程的系数就是代际收入弹性；二是转换矩阵的方法。可是，在1992年，Solon指出，以前的代际收入弹性的很多研究存在误差。原因有两个，一是同质性样本，即样本的选取存在同一区域，属于同一人群，违反了随机抽样的假设；二是使用某一年的收入而不是持久收入作为变量，使代际收入弹性的估算产生向下偏误。因此他提出，可以使用多年收入均值法或工具变量法来估计代际收入弹性。因此，1992年，Zimmerman研究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时，使用这两种方法测算出代际收入弹性高达0.5-0.7之间。其中，第一种方法是用4-5年的平均收入的作为永久性收入，第二种是用Duncan量表(Duncan Index)中的社会地位、教育等作为永久性收入的工具变量。当然，测算出的代际收入弹性只是父辈对子辈收入的影响的总和，人们更关心它背后的故事——不同传递方式的程度大小。1967年Blau和Duncan使用路径分析方法得出，美国的父代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来影响子代收入的程度小于子代个人通过奋斗来提高收入的程度。Mulligan（1999）运用“逐步回归法”估计了教育等因素能够解释3/5的代际收入弹性。韩军辉（2007）还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分别估算了收入的直接传递、教育和社会资本三条代际传递路径的程度。

Jacob Mincer、Gary Becker等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用人力资本来研究经济增长的热烈讨论。另一方面，人们又发现，居民个体收入的不同与其人力资本的不同密不可分，因此又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解释收入差距的问题，从而人力资本理论又和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了。Mincer（1957）首次尝试提出决定劳动者工资的方程，称为学校教育模型（The Schooling Model）。Mincer认为，如果某个劳动者放弃即期收入，选择继续教育，这时他继续教育的价值就等于未来收益预期增加值的现值。劳动者将会在其劳动期间获得该继续教育的价值。因此，该模型表明，学校教育可以增加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高的人容易获得高收入的职位。因此，不同的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完全是由他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水平的差异决定的。后来有学者认为该模型有一定缺陷，一方面指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有一定滞后性；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也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从而增加收入。即使如此，具有前瞻性的Mincer模型俨然已成为了各国经济学家研究个人收入问题的基础。

之后在1970年，Mincer就对学校教育模型进行了拓展，提出总收入函数（General Earnings Function）模型。他发现，个人收入与年龄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并且，他进一步发现，个人收入与年龄的这种关系是由工作经验带来的。于是，他提出在职培训也能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即著名的“干中学”。因此，Mincer理论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学校的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两部分，两者分别对个人收入有一定贡献。当时，Mincer根据如下模型得出了美国十年间

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收益率：

$$\ln y = \alpha + \beta_1 \text{edu} + \beta_2 \text{exp} + \beta_3 \text{exp}^2 + \varepsilon$$

(3-1)

其中， y 为劳动者工资收入， edu 代表教育年限， exp 代表工作经验年限， ε 是随机误差项。

β_1 、 β_2 、 β_3 是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 β_1 代表每增加1年的教育年限所带来个人收入增加的

百分比， β_2 与 β_3 反映工作经验与收入的二次曲线关系，收入先随着工龄上升，在某个工龄

时达到峰值后，便开始下降。

很多学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方程（1）的估计过于简单，可能无法得到“一致性”的估计结果，且 Mincer 工资方程中的学校教育、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变量并不能解释工资的大部分。因此，他们通过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下公式（3-2）：

$$\ln y = \alpha + \beta_1 \text{edu} + \beta_2 \text{exp} + \beta_3 \text{exp}^2 + \sum \lambda X + \varepsilon$$

(3-2)

其中， X 代表一组影响工资的控制变量，例如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所在行业所有制等， λ 表示对应变量的系数。

在众多修正的Mincer工资方程中，对收入代际传递的探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当时，人们疑惑，政府实施公共教育政策、法律上消除歧视等这一系列旨在保证机会均等的措施后，为什么贫困者、黑人、妇女仍然处于收入的底层。但是，社会学家是最早研究代际传递问题，但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收入问题上。Francis Galton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得出身高、体重和眼睛颜色等个人特征与其父母的特征呈正相关的结论（Goldberger, 1989）。经济学家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增加展开家庭这一视角，研究收入分配在代际间的关联性（胡永远，2011）。Atkinson最早在1980年运用对数线性模型研究收入的代际传递，如公式（3-3）：

$$\ln Y_{1t} = \alpha + \beta \ln Y_{1t-1} + \varepsilon_{1t}$$

(3-3)

式(3)表明, 家庭*i*中子代的收入 $Y_{i,t}$ 受其上一代的收入 $Y_{i,t-1}$ 的影响, ε 是随即误差项。 β 就代表了收入代际传递的程度, 称为代际收入弹性。表明父代收入增加1%时, 子代收入增加的百分比。 β 的值越大, 就说明父代的收入对子代的收入影响越大, 从而收入的代际传递程度就越高。

本文综合修正的Mincer方程和收入代际传递的对数线性模型, 构造一个影响个人工资收入的模型, 来测算收入代际传递的程度, 如式(3-4):

$$\ln Y_{i,t} = \alpha + \beta_1 \text{edu}_{i,t} + \beta_2 \text{exp}_{i,t} + \beta_3 \text{exp}_{i,t}^2 + \beta_4 \ln Y_{i,t-1} + \sum \lambda X_{i,t} + \varepsilon_{i,t}$$

(3-4)

其中, $Y_{i,t}$ 是家庭*i*中子代的收入, $\text{edu}_{i,t}$ 、 $\text{exp}_{i,t}$ 、 $\text{exp}_{i,t}^2$ 是影响子代收入的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限、工作经验年限的平方, $X_{i,t}$ 是影响子代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 $Y_{i,t-1}$ 是父代的收入。 β_1 、 β_2 、 β_3 、 λ 、 β_4 分别是各变量的系数。这样, 测出来的 β_4 就是收入代际传递的程度了。

本文基于机会均等的假设, 将教育、职业经验培训和年均工作时间作为个人奋斗的代理变量, 研究个人奋斗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大小。另一方面, 收入的代际传递对个人收入也产生作用。所以本文首先利用上述(4)式模型回归, 综合比较 β_1 、 β_2 、 β_3 和 β_4 的大小, 从而可以比较个人的收入代际传递和努力奋斗的所带来的收益率大小。

进一步地, 本文还将对比不同个人因家庭出身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努力所带来的收益率的不同。本文将数据样本按上一代收入多少划分为来自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三组。比较来自不同收入组的个人的奋斗程度对收入提升的作用大小。由于本文的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且样本的调研时间是自2008年至2010年, 所以, 根据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的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可计算出个人年收入低于8919元的群体属于低收入组别, 8919元至17839元之间的属于中等收入组别, 高于17839元的属于高收入组别。需要强调的是, 此处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等于中产阶级。虽然两者都是出于中间状态, 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从收入的角度对人群进行划分, 而中产阶级还需要从生活质量、职业、消费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去定义。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研中心合作开展调查的“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本数据调查首先在广东开展, 范围

为城乡样本社区，总共抽取了16个样本区县，每个样本区县抽取了4个（村）居委会，每个样本（村）居委会抽取了25户，总计调查1600个样本家庭户。本调查采用入户访问的方式，对样本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均进行调查。该调研自2008年起每年开展一次，建立了村居、家庭、成人、少儿4个层次的数据。该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试图全方面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动、变化的家庭生活和人民个体发展状况。调查的主要内容包含教育经历、婚姻子女、职业生活、日常生活和健康五大板块。

本文采用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2008年、2009年和2010年3年的成人问卷数据。首先，本文需要考察子代收入受其父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把样本设立为子一代，且限定与孩子一代和其上一代都存在收入的完整信息的家庭。其次，未毕业的学生没有收入，无法测量其个人奋斗对收入的作用，所以本文剔除职业类别为学生的样本。这样2008年至2010年3年共获得样本1185个。

三、变量与假设

（一） 个人收入

本文中收入的概念是指个人可支配收入。“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中的个人年收入主要包括职工基本工资、职工浮动工资（加班费、补贴、奖金等）、实物奖励、个体经营净收益、个体被雇者收入、第二职业收入（临时性工作、兼职等收入）、其他劳动收入、退休金和其他非劳动性收入。另外，样本中包含部分个人收入为0的观测值。为了保留样本，本文借鉴 Kenneth & Dean（1998）的方法，将收入为0的观测值重新赋值为1，从而在取自然对数时，仍可以保留该观测值。

（二） 努力程度

1、 教育

根据“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中的学历调查，本文采用学历作为受教育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对其进行赋值：研究生学历赋值为5，大学本科、大专赋值为4，高中、中专、技校为3，初中为2，小学为1，文盲为0。

2、 职业经验

根据 Mincer 的研究，职业经验不仅仅是通过具体的培训项目获得，更多地是通过在实践中去累积。职业经验本身很难度量，本文采用“工作年限”变量作为职业经验变量。该调研

中有“请问您第一份工作是从哪年开始的？”和“请问您现在的工作是从哪年开始的？”两个与工作年限相关的问题。本文采用后者。因为有时劳动者新寻找的工作是跟前一份工作属于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的，职业经验往往需要从头开始积累，所以作者认为用劳动者目前工作的工作年限数据更适合。

3、 年均工作时间

“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中要求被访者回答近1年的平均年工作小时数。该值越大，也可以说明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越强。

（三） 其他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类型、户口和健康状况，本文也对其进行赋值。男性设定为1，女性设定为0。已婚设定为1，未婚设定为0。拥有城镇户口设定为1，农村户口为0。职业类型根据李春玲（2005）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中的社会地位排序进行赋值，更符合中国的特点。本文根据该文中的划分将职业类型设定为8种类型：高层领导干部(市长、法院院长、市人大主任等)与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等)设定为7，中层领导干部（例如政府机关局长）、企业高管(厂长、经理等)和一些社会声望较高的专业人员(律师、中学教师等)为6，普通专业人员(如作家、飞行员、主持人、医生)、政府普通干部、特权较大的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例如警察、工商税务人员)、农村地区领导干部与私营企业老板为5，低层专业人员(模特、护士、幼师等)、政府部门普通办事人员、较具声望的商业服务人员(机关单位司机、保险公司业务员)以及建筑队包工头为4，农村技术人员(兽医、农机站技术员等)、技术工人(例如电工)、具有一定技术性的商业服务人员(的士司机、厨师等)、个体户、专业户为3，体力劳动工人、无技术性的商业服务员工（服务员、清洁工、菜贩等）、农业劳动者为2，搬运工、保姆、车夫等为1，无业为0。健康状况考虑个体是否正患有严重疾病，近1年内患严重疾病者设定为2，近1年内患轻微疾病者设定为1，近1年内不曾患疾病者为0。

（四） 样本特征及其描述性统计

“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中询问了每位访问者所有子女的代码，从而可以根据这一线索联系子代和父代(父亲或母亲)。本文以子代的个人收入作为因变量，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工作年限、年均工作时间、户口、健康状况、作为自变量，再在自变量中加入其父代的个人收入，得到 $income_i$, $parent's\ income_i$, age_i , sex_i , $marriage_i$, $education_i$, job_i , $experience_i$, $working\ hours_i$, $Hukou_i$, $health_i$ 数据文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下

表 1 和表 2。

表 1 显示了父代和子代收入的整体样本和按父代收入划分的不同收入分层子样本的个人收入的均值、个人收入的方差、子代的年龄均值和年均工作时间。对于年龄，子代的年龄均值全部为 30 岁左右，刚好处于中年时期，收入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对于个人年收入，整体样本中，子代收入平均为 5461.04 元，父代收入为 4145.27 元，子代略高于父代。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样本中，子代的平均收入 4785.38 元远高于其父代的平均收入 1122.83 元，且收入波动性较小，说明低收入家庭中子代的收入情况基本能比上一代有所改善。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样本中，子代收入的波动性减小了，但其收入均值相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代的收入均值不升反降，且比其父代的平均收入少 9737.74 元。来自高收入家庭的样本中，子代年收入的均值也比其父代年收入均值小 18435 元。而对于年均工作时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样本的年均工作时间最长，为 1831.50 小时，来自高收入家庭的群体次之，中等收入群体的年均工作时间最少。总的来说，这说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个人，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向更高的收入分层流动的意愿非常强，也非常努力去实现它。而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人，具有维持现状的意愿，从而他们很难再往更高的收入分层流动，甚至还会有向下流动的趋势。来自高收入家庭的群体则希望也能够基本保持其收入分层。

表 1 样本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分类	子代				父代	
	收入均值	收入标准差	年龄均值	年均工作时间均值	收入均值	收入标准差
总体	5461.04	13693.75	31.83	1820.94	4145.27	29745.38
来自低收入家庭	4785.38	9261.38	31.87	1831.50	1122.83	2134.27
来自中等收入家庭	4174.62	6249.75	30.00	1304.67	13912.38	3210.30
来自高收入家庭	14401.22	21976.73	31.75	1808.58	32836.22	14580.39

表 4-2 表示，样本中男性比女性多 567 人，已婚个人比未婚个人多 21.85%，具有农村户口的个人比具有城镇户口的个人多 617 个。学历方面，高中、中专、技校（含）以下学历的样本量相当大，占比达 94.51%。职业分层方面，样本集中于中下层（第 3 层和第 4 层），占 83.04%，最低层占比也远大于最高层，分别为 7.76%和 0.08%。而健康状况方面，健康的人群几乎达到不健康人群的两倍。总体来说，这种情况虽然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的国情，但

也会因随机抽样的问题对计量模型的估计产生一定影响。学历、职业分层、健康状况整体偏低,农村户口人数远大于城镇户口人数,将会导致本研究的样本大多集中于社会上普遍认同的自身条件不好的群体,这难免会导致本文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揭示个人特征较差的群体的特点,而很难发现个人特征较为优秀的人群的状况。

表2 样本特征汇总表

特征	类别	数量	比例
性别	男性	876	73.92%
	女性	309	26.08%
婚姻	已婚	722	60.93%
	未婚	463	39.07%
学历	硕士	1	0.08%
	本科、大专	64	5.40%
	高中、中专、技校	381	32.15%
	初中	463	39.07%
	小学	224	18.90%
	文盲	52	4.39%
职业分层	第8层(最高)	1	0.08%
	第7层	10	0.84%
	第6层	20	1.69%
	第5层	72	6.08%
	第4层	260	21.94%
	第3层	724	61.10%
	第2层	6	0.51%
	第1层(最底)	92	7.76%
户口	城镇户口	284	23.97%
	农村户口	901	76.03%
健康状况	很健康	751	63.38%
	一般	36	3.04%
	不健康	398	33.59%

四、 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19 中的多元回归分析,对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个人收入的作用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它们分别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主要关注自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T 值及其显著性检验 P 值、方程的 F 统计量和 P 值,可调整的多元决定系数 R^2 。

文中所使用的回归方程将对子代个人收入和父代个人收入取对数,该做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

- (1) 因变量是子代的个人年收入都是正值,适合使用对数。
- (2) 进行最小二乘法的回归通常要求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一般而言取对数能使因变量更加易于趋近于正态分布。
- (3) 样本数据为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差异性较大,这可能导致观测值在不同时点属于不同分布的情形,采用对数可以一定程度地减轻差异差距。

1. 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收入影响的测度

本文根据上文公式 (3-4) 进行拓展,将 $X_{i,t}$ 设定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年均工作时间、户口和健康状况。因此,该模型扩展为:

$$\ln Y_{i,t} = \alpha + \beta_1 \ln Y_{i,t-1} + \beta_2 \text{age}_{i,t} + \beta_3 \text{sex}_{i,t} + \beta_4 \text{marriage}_{i,t} + \beta_5 \text{edu}_{i,t} + \beta_6 \text{job}_{i,t} + \beta_7 \text{exp}_{i,t} + \beta_8 \text{exp}_{i,t}^2 + \beta_9 \text{working hours}_{i,t} + \beta_{10} \text{Hukou}_{i,t} + \beta_{11} \text{health}_{i,t} + \varepsilon_{i,t}$$

(4-1)

其中, $Y_{i,t}$ 是家庭 i 中子代的收入, $\text{edu}_{i,t}$ 、 $\text{exp}_{i,t}$ 、 $\text{exp}_{i,t}^2$ 、 $\text{working hours}_{i,t}$ 分别为子代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和年均工作时间,代表子代自身的努力程度。

$\text{age}_{i,t}$ 、 $\text{sex}_{i,t}$ 、 $\text{marriage}_{i,t}$ 、 $\text{job}_{i,t}$ 、 $\text{Hukou}_{i,t}$ 、 $\text{health}_{i,t}$ 分别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类别、户口和健康状况,是影响子代收入的控制变量。 $Y_{i,t-1}$ 则为父代的收入。

利用 SPSS 19 软件根据 (4-1) 式的模型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详见表 3:

表3 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收入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方差膨胀因子	系数	方差膨胀因子
父代个人收入	0.1046 ^{***}	1.133	0.1143 ^{***}	1.12
年龄	-0.0167 [*]	2.951	-0.0315 ^{***}	2.73
性别	0.3235 ^{**}	1.09	0.3052 ^{***}	1.09
婚姻状况	0.2778 [*]	1.811	0.5378 ^{***}	1.64
教育程度	0.3771 ^{***}	1.205	0.3670 ^{***}	1.20
职业类别	0.7813 ^{***}	1.238	0.8198 ^{***}	1.22
工作经验	0.1821 ^{***}	10.358	0.0967 ^{***}	2.02
工作经验的平方	-0.0026 ^{***}	10.335		
年均工作时间	0.0012 ^{***}	1.241	0.0012 ^{***}	1.19
户口	-0.0023	1.174		
健康状况	0.1601 ^{***}	1.075	0.1659 ^{***}	1.07
调整后的 R ²	57.90%		57.00%	

注：* 代表p 值<0.1, ** 代表p 值<0.05, *** 代表p 值<0.01。

模型 1 列为运用式 (4-1) 进行回归的结果。首先, 收入的代际传递系数为 0.1046。该结果表示, 当父代的收入每增加 1%时, 子代收入也随之增加 0.10%。其次, 劳动者个人奋斗的结果也较明显。当教育程度每上升一个等级, 个人收入即增加 37.71%。年均工作时间每增加 1 小时, 也会显著带来 0.12%的收入增加。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显著, 图形状为转折点在 35.02 (年) 处的倒 U 型。而本样本中工作经验在 35 年以上的子样本量为 35 个, 仅占 0.30%。此时, 可以将子代工作经验对其收入近似看做是线性影响的。为了降低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强共线性, 模型 2 剔除了工作经验的平方, 同时剔除了对子代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户口”, 再一次进行了回归。模型 2 与模型 1 相比, 结果相差并不大, 但是, 会影响到 OLS 估计结果的多重共线性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从而估计结果更具显著性。

2. 代际传递和自身努力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比

虽然表3中分别对代际传递和自身努力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测度,但两者不能进行比较。收入的代际传递的测算结果 β_1 为弹性值,表示父代收入每增加1%子代收入所增加的百分比。而个人奋斗的测算结果 $100 * \beta_5$ 、 $100 * \beta_7$ 、 $100 * \beta_9$ 半弹性值,分别表示教育程度每增加1个等级、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和年均工作时间每增加1小时为子代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因此,本文采用分样本回归,转而比较来自不同收入组别家庭的子代的努力程度对其收入的影响程度,从而比较代际传递和自身努力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大小。首先根据上文计算的标准,将样本按其父代收入划分为三组,父代年收入小于8919元的样本属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组别、父代年收入在8919至17839之间的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组别,父代年收入大于17839元的属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组别。然后对三组分别用上述(5)式中的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如下表4:

表4 代际传递和自身努力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比

自变量	来自低收入家庭		来自中等收入家庭		来自高收入家庭	
	系数	方差 膨胀因子	系数	方差 膨胀因子	系数	方差 膨胀因子
父代个人收入	0.0618***	1.075	-0.4910	4.842	0.9761***	1.243
年龄	-0.0399***	2.758	-0.1629	6.14	0.0645*	2.834
性别	0.3802***	1.098	-1.0058	1.479	0.7660*	1.416
婚姻状况	0.5455***	1.628	0.5400	3.281	-0.4435	2.25
教育程度	0.3052***	1.152	0.7097	12.812	0.5418**	1.537
职业类别	0.9460***	1.207	-0.1282	7.023	0.4889***	1.778
工作经验	0.1038***	2.054	0.2992*	2.568	0.0071	1.747
年均工作时间	0.0013***	1.189	0.0014*	2.062	-0.0001	1.736
健康状况	0.1351**	1.062	0.2693	2.175	0.6032***	1.326
调整后的 R ²	59.80%		71.80%		49.60%	

注: * 代表p 值<0.1, ** 代表p 值<0.05, *** 代表p 值<0.01。

对于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方差膨胀因子大于5说明年龄、教育程度

和职业类别三个变量共线程度较大,故导致该回归结果有偏误。因此,本文将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子样本的回归方程中,剔除职业类别变量,进行再一次回归,结果于如下表5中表明,剔除职业类别变量后,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共线程度较弱,结果可行。

表5 调整后的代际传递和自身努力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比

自变量	来自低收入家庭		来自中等收入家庭		来自高收入家庭	
	系数	方差膨胀因子	系数	方差膨胀因子	系数	方差膨胀因子
父代个人收入	0.0618***	1.075	-0.0120	1.812	0.9761***	1.243
年龄	-0.0399***	2.758	-0.1761**	4.416	0.0645*	2.834
性别	0.3802***	1.098	-0.9673	1.403	0.7660*	1.416
婚姻状况	0.5455***	1.628	0.3694	2.182	-0.4435	2.25
教育程度	0.3052***	1.152	0.4972*	2.666	0.5418**	1.537
职业类别	0.9460***	1.207			0.4889***	1.778
工作经验	0.1038***	2.054	0.2969***	2.518	0.0071	1.747
年均工作时间	0.0013***	1.189	0.0014***	2.04	-0.0001	1.736
健康状况	0.1351**	1.062	0.2042	1.339	0.6032***	1.326
调整后的 R ²	59.80%		74.00%		49.60%	

注: * 代表p 值<0.1, ** 代表p 值<0.05, *** 代表p 值<0.01。

由表5可以看出,贫穷和富裕这两个极端的代际传递较明显,两者中又属富裕家庭的收入代际传递程度高,父代的收入每增加1%,子代的收入就每增加0.98%。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个体来讲,父代的收入每降低1%,子代收入就降低0.06%。但对于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体来讲,收入的代际传递并不显著,个人奋斗才是收入提高的主导者。这说明,贫穷和富裕不仅都会“遗传”,且富裕家庭中父代会“遗传”相当多的收入给子代。个人奋斗的作用分别有三个指标进行衡量。第一,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对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人收入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却对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个体的收入提高作用最大,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体其次,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个体的收入提高作用最小。至此本文发现,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原来很“势利”,能给家庭出身好的人锦上添花,却很少为家庭出身低的人雪中送炭。其次,工作经验仅对出身在贫穷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体产生显著影响,

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个体却不因这方面的努力而提高个人收入。来自中等家庭的个体每增加1年工作年限所带来个人收入的增加比例比来自贫穷家庭的个体多19.31%，这说明，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群体通过经验累积来提高自身的收入的效果比较明显，可着重增强这方面的努力。第三是年均工作时间，仍然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不显著。并且，年均工作时间对个人收入的提升作用对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群体作用相差无几，每增加1小时，约能提高0.15%的个人收入。

总的来说，经过本节将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作用的对比结果来看，可以说，代际传递的效果仍然大于个人自身的努力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个体，虽然通过各方面的奋斗可以提高收入，但却相当艰难。相对来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个体的收入提高却轻松许多，仅有教育程度方面的努力就可对其收入有大幅的显著影响，再者教育也并不全是代表着个人努力，以往已有学者表示教育也是收入代际传递的路径之一。所以，对于来自高收入的个体来讲，代际传递对个人收入的作用大于个人奋斗的现象尤甚。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例子，富豪高官子女几乎都具有很高的学历，相当部分还到国外接受先进的科学知识，却有诸如中国首富宗庆后之女宗馥莉17岁成为自己的海外公司的管理者的例子，这是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个体经过万般努力都无法达到的。

五、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首先通过对总体样本回归测算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程度，再运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比较了代际传递和个人奋斗对个人收入影响的大小。研究表明，第一，整体来看，广东省的居民的确存在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但同时，个人的各方面努力程度也可以显著地提高收入。第二，个人的努力程度对收入的作用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不同。其父代处于高收入分层的子代几乎只需要付出极少的努力（该努力很有可能也取决于其父代）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来自于中低收入分层家庭的子代则要付出较多的努力才能达到与前者相同的个人收入状况。并且，父代为低收入阶层的子代要比父代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子代更为艰辛，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年均工作时间对他们收入的影响作用是最小的。对于出身贫穷的孩子而言，他们的收入提高的迫切愿望和目前的现实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仅仅是因为父代的收入处于底层，他们就需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

本文首先以机会均等为假设的前提下，其上一代处于收入底层的人，即使出身不好，

但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自己的收入,使自己所处的收入阶层有所提升。但是,经过实证研究后,证明上一代的困境会传递给后代,后代要实现自己阶层的改变是相当困难的。这说明,当代中国在提供机会平等方面实际上还大量存在不足之处,看似是一种“形式上的”机会均等。例如,北京曾在2000年出台过法规,对进城务工人员进入某些行业、领域、地区进行限制;我国这个“人情社会”使人们在收入、职业等方面的竞争变成了社会资本的竞争。

六、可能存在的计量偏误

Friedman(1957)指出,个人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永久性收入两种。目前可观测到的收入为暂时性收入,而永久性收入指的是未来一定时间内比较稳定的收入,是无法直接观测出来的。正因如此,Solon(1992)提出,目前很多研究用可观测到的暂时性收入作为永久性收入的代理变量来研究收入的代际传递,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误。在本研究中,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83岁,处于中年阶段,因此本文认为,个人自中年阶段开始收入逐渐趋于稳定,可以将暂时性收入作为永久性收入的替代变量。该假设肯定存在不足之处,但由于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故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调查(CFPS)”的调查方式为入户访问,对住在同一居所中的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可如今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如此之大,很多人外出打工,不与父母同住,本调研无法追溯到这类群体来与父辈匹配。事实上,随着子代年龄增长,与父母同住的概率会越来越小。能够观测到的与父母同住的,一种可能是仍在上学或经济独立的时间不久,另一种可能,但凡成年的子代有经济条件者,大多会选择“分家”建立新家庭,故同住样本应集中于低收入阶层(韩军辉,2011)。再者,本文选取的有完整两代人关系的1185个子代样本中,全部居于广东省,职业分层多集中于中下层,且76.03%的样本具有农村户口。以上特征均使研究具有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区域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违背了OLS估计的随机抽样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 Arthur M.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t, The Big Tradeoff.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75
- [2]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接班路上的“富二代”:关于守成与创新,变革与老臣.南方都市报,2010-4-7(GC06)
- [3] 李晓明.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评述.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6, 3: 75-78

- [4] 方鸣.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p11
- [5] 胡永远.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经济学动态, 2011, 2: 147-151
- [6] 高鸿祯. 论收入不平等性指标.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4: 26
- [7] Jha, S. K., 1996, "The Kuznets Curve: A Reassessment", World Development, 24:773-780
- [8] Ram, 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he Postwar Developed World.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97, 64:576-583
- [9] 李实, 赵人伟.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分析. 经济研究, 1997, 9: 19-28
- [10] Mincer Jacob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 [11] 彭竞. 明瑟收入方程的本土化研究述评.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 2010, 10: 100-103
- [12] 诸建芳.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 经济研究, 1995, 12
- [13] Byron, Raymond P. and Evelyn Q. Manaloto.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1990, 38: 783-796.
- [14] Bian Yanjie.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3):366-385
- [15] 柏培文. 工人工资决定因素前沿研究综述. 管理评论, 2011, 5: 96-112
- [16]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 45
- [17] Schultz, T. P.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Income in the world: How it is Changing and Why.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8, 11: 307-344
- [18] 蔡昉, 都阳. 中国地区增长的趋同与差异. 经济研究, 2000, 10
- [19] 陆铭, 蒋仕卿. 重构“铁三角”: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 2007(6):14-22
- [20] 王小鲁、樊纲. 中国收入差异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研究, 2005, 10: 24-36
- [21] Karen Moore.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ork paper, 2001
- [22] Becker, Gary.S.& Nigel Tomes.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 6:1153-1189
- [23] Bowles, S. & Gintis, H.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 2002, 16(3): 3-30
- [24] 王兆萍. 解读贫困文化的本质特征. 中州学刊, 2004, 6: 173-176

- [25] Atkinson, A. B., A. K. Maynard. Evidence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Britain. *Economic Letters*, 1978, 1: 183-388.
- [26] Atkinson, A. B. On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Britai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80, 3(2): 194—215.
- [27] Solon, Gary.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393-400
- [28] Zimmerman, D. 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Economic St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3):409-429
- [29] Peter M. Blau &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7
- [30] Mulligan, C. Galton Versus the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Inherit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6: 184-224
- [31] 韩军辉.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实证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博士论文, 2011
- [32] 萨托利. 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373.
- [33] 李吉雄.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影响和调整. *求实*, 2010, 12: 50-54
- [34] 尹恒、龚六堂、邹恒甫. 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经济研究*, 2002, 8: 83-95
- [35] 雅各布·明塞尔. 人力资本研究(中译本).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36] 方芳. 明瑟尔. 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与经济*: 2006, 2: 16-18
- [37] 徐文婷.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决定的影响——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沈阳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15
- [38] Goldberger, A. S. Economic and mechanical model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3):504-513
- [39]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40] 贺大兴, 姚洋.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 2011, 1: 4-17
- [41] 李德声. 论人权的事实平等与差别保护.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44-47
- [42] 程立显. 论社会公正、平等与效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3): 58-64
- [43] 徐菲菲. 论我国政府为实现机会平等中的职责.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1-28
- [44] 邢春冰.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 *管理世界*, 2008, 5: 55-64
- [45] 蔡昉.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 *经济学动态*, 2010, 12: 4-10
- [46] 李春玲. 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6

- [47] 顾纪瑞.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方法、标准之比较. 现代经济探讨, 2005, 10: 10-16
- [48] Couch, Kenneth A., Dean R. Lillard. Sample Selection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in Earnings. *Labour Economics*, 1998, 5(3):313-329
- [49] 李春玲. 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 *社会学研究*, 2005 (2) : 74-102
- [50]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51] Mazumder, B.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US: a New Look a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Working Paper NOWP-01-18, 2001:1-18
- [52] Dearden, L., Maehin, S. and Reed, H.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440)
- [53] Lee Soltow. *Toward income quality in Norway*. Madison,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 [54] Behrman, J. & P. Taubman.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Estimates and a Test of Becker's Intergenerational Endowments Mo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5, 67(1)
- [55] 程立显. 论社会公正、平等与效率.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3:58-64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 W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Based on Mincer's General Earnings Function, this article used CFPS data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firstly. What's more, in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society can provide all people with equal opportunity, I compare the role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striving for personal income by 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n personal income is greater than individual effort indeed. Although individuals from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can try their best to improve income, actually it is quite a difficult. Relatively speaking, individuals from high-income families are easier to do.

Key words: income differenc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dividual striving

收稿日期: 2013-08-10

作者简介: 杜薇,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曹旭东】